



陕西出版资金精品项目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地域文化

西北地域文化 唐代边塞诗 与



处对中原文化的自信。

的文学重构，是对异域文化的欣赏与包容，源于他们内心深
是新奇神秘的文化异域，唐诗对胡乐、胡舞、胡姬、胡儿等

对唐代诗人而言，西北不仅是悬远荒凉的苦寒边塞，还



王永莉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陕西出版资金精品项目

TANGDAI BIANSAISHI YU XIBEI DIYU WENHUA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地域文化

王永莉 著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地域文化/王永莉著. —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612-5108-9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6625号

策划编辑:杨军

责任编辑:杨军

出版发行: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电话:(029)88493844 88491757

网址:www.nwpup.com

印刷者: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7 mm × 960 mm 1/16

印张:12.25

字数:205千字

版次: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前 言

至少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时，西北地区便开始逐渐进入中原士人的视线，从细君公主《黄鹄歌》所谓的“吾家嫁我今方一，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的悲愁情绪，到昭君出塞的无奈之举，在中原士人眼里，无论是西域的乌孙，还是漠北的匈奴，都是与中原迥异的陌生存在：那里不仅地理环境荒凉苦寒，渺无人烟，就连生活习惯、文化风俗也与中原截然不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逐水草放牧，吃畜肉，饮酪浆，着毡裘，衣左衽，好勇斗狠，残酷嗜杀，与长期浸淫在儒家仁、义、礼、智、信教化之下的中原人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汉族政权偏安江南，游牧民族横行黄河流域，双方隔河对峙，交往日少，隔膜日深，中原士人视野中的西北，便始终停留在秦汉以来的传统悲愁落寞中……隋唐以降，随着中央王朝疆域的向西扩展与统治者致力经营西域的边疆政策的推行，西北才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唐朝是诗的国度，唐人几乎人人能吟诗，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甚至连烜赫一时的太监高力士也能吟出“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的哲理诗来，唐人的诗才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唐诗的题材亦空前广泛，从山水田园到塞北江南，从友人离别到亲朋欢歌，皆可入诗，其中尤以边塞诗最为瑰丽奇伟。举凡西北边塞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战和冲突，以及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等，皆在唐代诗人的关注之下。雄奇的山川，广袤的大漠，独特的饮食，新颖的乐舞，极大地冲击着中原士人的感观与心理，如一朵奇葩盛开在唐诗的无边花海中，彰显着一个独特、豪放、雄奇的大唐。

从初唐到盛唐期间，统治者大多雄才大略，致力于对西北疆域的经营，先后在河西、陇右、漠南等地设置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与三受降城等军事机构，并赋予这些守边将领以较大权力，诸如征辟文人入幕、推荐幕僚入朝为官等，让那些立志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低级官吏与白衣文

人们看到了实现理想的希望。他们积极响应边疆幕府将领的征召，告别亲友，佐身戎幕，在恶劣的环境与残酷的战争中，讴歌壮丽河山，抒写心路历程，从独特的地理环境到新奇的风土人情，再到身处边塞的心理体验与情感变化，均化作那茫茫黄沙、天山物华、胡姬如花，在幽怨的琵琶与悲切的胡笳声中，抒发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强烈渴望……

有唐一代，高度发达的经济，空前繁荣的文化，广袤辽阔的疆域，为边塞诗的壮美雄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思想基础。唐人笔下的西北边塞，往往带着强烈的豪迈之情与不同凡响的霸气：战则刀兵相见，体现着大唐雄风；和则礼尚往来，彰显着雍容气度。

边塞之于唐人，不仅是悬远荒凉的苦寒异域，还是建功立业的广阔天地，足以让他们傲视苦寒，笑对风霜，以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抒写自己的浪漫情怀，无论是“一川碎石大如斗”的走马川，还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北庭都护府，还有那“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的优钵罗花，隐喻的都是唐人不惧严寒恶劣环境的乐观与从容。一定程度上，无论是恶劣苦寒的边塞环境，还是生长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奇花异草、丰富物产，都是孕育西北独特地域文化的地理基础，更是西北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西北异域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的广泛传播，从饮食物用到服饰乐舞，甚至于宗教信仰，唐人均报之以博大的胸襟，欣赏、接纳、包容，对异域文化的强大冲击毫不为意，他们穿胡服，学胡语，奏胡乐，观胡舞，与胡人为友，从头到脚都流露出高度的文化自信，绝对堪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到“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从“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到“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还有那“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等等，唐人对胡乐、胡舞、胡姬、胡儿的文学重构，是对异域文化的欣赏与包容，源于他们内心深处对中原文化的自信。还有些诗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恰如戎昱诗中的“南看汉月双眼明，却顾胡儿寸心死”与元稹笔下的“何时窄袖短貂裘，胭脂山下弯明月”等，对远离家乡的胡儿怀念家乡、民族服饰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具有强烈的普世情怀，如果对中原文化缺乏高度自信，又岂能推己及人？

如果我们把唐代边塞诗人比作画家，边塞诗就是他们手中神奇的画笔，西北地域文化就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绚丽画卷，蓝天白云下，碧绿草原上，成群的牛马，骁勇善战的战士，能歌善舞的女子……诚然，唐代边塞

诗吟咏的西北边塞，反映的只是西北地域文化的冰山一角，无数神秘、未知的领域还等着我们去发现。即便如此，这些模糊的影像，已足以引发我们关于西北的遐思，唤醒我们对草原、大漠的渴望与向往……但愿这本小书的问世，可以激发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边塞、边塞诗乃至唐诗的浓厚兴趣以及对西北文化的更多关注。

本书获得陕西出版资金精品项目，在此谨向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时间仓促，学识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永莉
2016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唐代西北及其文学意象	1
一、唐代西北疆域变迁	2
二、唐代边塞诗中的西北意象	14
第二章 “何时窄袖短貂裘，胭脂山下弯明月”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服饰文化	34
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34
二、“羔子皮裘领仍左”	36
三、胡妆	50
四、农牧服饰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53
第三章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饮食文化	59
一、以肉为食	59
二、以酪为浆	67
三、“羊脂沐发”	71
第四章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日常生活	74
第五章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音乐	90
一、唐代流行的西北胡乐	90
二、“胡乐”在中原的传播与影响	122
第六章 “胡旋女”与“胡腾儿”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舞蹈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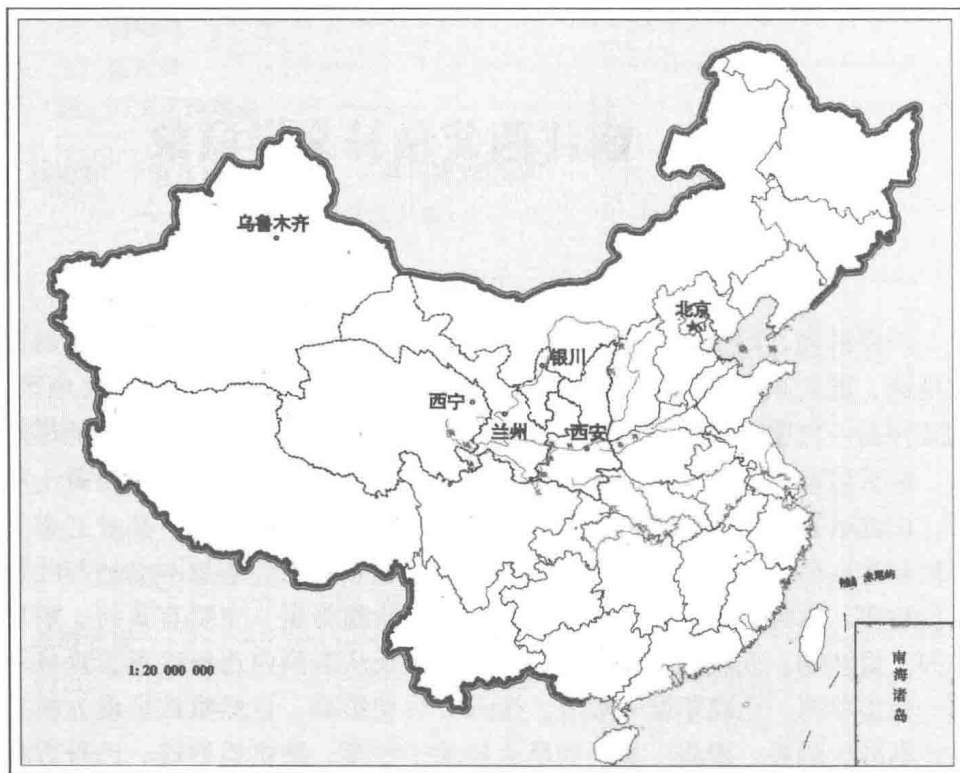
一、胡旋舞	128
二、胡腾舞	132
三、柘枝舞	137
四、西域其他舞蹈	142
第七章 “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	
——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宗教	145
一、“赛神”	145
二、唐代边塞诗中的“胡僧”意象	150
三、“拂云堆”	158
第八章 唐代边塞诗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	164
一、唐代边塞诗与东西方民族融合	164
二、唐代边塞诗与东西方经济交流	173
三、唐代边塞诗与东西方文化融合	176
参考文献	184
后记	187

第一章 唐代西北及其文学意象

所谓西北，即指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的西北地区。地理意义上的西北地区，即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宁夏北部、甘肃中西部。就地形而言，该区以高原、盆地和山地为主，高原有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山地有新疆境内的天山山脉、阿尔金山脉，新疆、青海、甘肃三省交界的祁连山脉、昆仑山脉等；盆地则包括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与吐鲁番盆地等。水资源相对短缺，以内流河、内陆湖为主，主要有黄河、塔里木河、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等。自然景观从东到西逐渐表现为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荒漠，受人类活动影响，自然植被呈现为明显的逐渐减少趋势。沙漠广布，如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漠，兼有不少石质戈壁、沙丘。

西北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内陆，地形西高东低，西北部的青藏高原和北部的蒙古高原，共同阻挡了来自西部、北部的湿润气流；东南距太平洋比较遥远，西南季风影响较弱，仅能影响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分区域，因此，西北地区除东南部分区域为温带季风气候以外，其余区域基本为温带大陆性气候。相对而言，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全年降水量整体稀少，且呈现为从东向西递减的趋势，东部年降水量约为400毫米，往西逐渐递减到200毫米，有些地区甚至在50毫米以下，干旱是西北地区的主要自然特征。太阳辐射较强，气温的日较差和年较差都很大。新疆吐鲁番盆地是夏季全国最热的地区，托克逊则是全国降水最少的地区。

行政区划意义上，现今的西北则主要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陕西省五个省级行政区，简称“西北五省”。但是，唐代西北的地域范围则要大多。为了直观呈现唐代行政意义上的西北地域范围，本书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等史籍为依据，追溯有唐一代西北疆域的盈缩与变化，为讨论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地域文化圈定一个明确的地理范围。



中国西北五省行政区划示意图

一、唐代西北疆域变迁

1. 河西陇右地区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8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李渊就是唐高祖。唐王朝建立之初，各地割据势力此起彼伏，其中，河西地区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当属盘踞在金城（今甘肃兰州附近）的薛举与称雄凉州（今甘肃武威）的李轨。

薛举，隋朝末年人，祖籍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其父薛汪时迁徙至金城郡。大业十三年（618年），隋末战乱，薛举趁势起兵，自称西秦霸王。同年七月，薛举称帝，并迁都秦州（今甘肃天水）。隋炀帝派兵讨伐，双方在陇西各地激战，隋军大败，鄯、廓二州失守，陇西之地尽归薛举治下，兵力达13万人之多。八月，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位称帝。初

建政权的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出兵征讨，历经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激战，同年十一月，荡平薛举、薛仁杲势力。薛举所占的陇西鄯、廓等地纳入唐朝统治范围，唐朝疆域随之向西扩展。

李轨，字处则，甘肃武威人，世居河西，为河西著名豪望之族，为人机智，广施赈济，在当地声望极高。隋炀帝大业末年，任武威郡鹰扬府司马。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8年），李轨在武威起兵，攻破内苑城，俘虏了镇守武威的隋朝官员谢统师等，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次年，李轨正式称帝，史称大凉。为争夺地盘，大凉政权与西秦政权曾多次混战，最终，李轨大获全胜，全歼薛举之兵，先后攻克张掖、敦煌、西平（今青海西宁）、枹罕（今甘肃临夏）等地，河西五郡尽归李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大凉尚书安兴贵执李轨降唐，从此，河西地区逐渐纳入唐王朝统治区域。

除最初的薛举、李轨割据政权以外，河西还分布着吐蕃、吐谷浑、铁勒契苾部、党项羌、黑党项、白狗羌、白兰羌等不少游牧部族。西北经河西走廊出阳关、玉门关即是西域，西汉以来号称有鄯善、车师前国、车师后国、龟兹、乌孙、罽宾、焉耆等三十六国，最初皆臣服于匈奴。汉武帝一面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一面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西域诸国慑于西汉强大的国力纷纷朝贡臣服。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以宫人王昭君嫁之，号“宁胡阏氏”，拉开了汉匈友好的序幕，此后，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持续数十年之久。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开始了西汉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自此，西域地区正式纳入西汉版图。西汉末年，王莽专权，挑拨汉朝与匈奴关系，致使汉匈关系破裂，西域地区亦陷入混乱之中，不复归中央管辖。东汉初年，中央政权再次经营西域，颇有成效。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轮流执掌政权，国内矛盾尖锐，无力经营西域，西域重新陷于小国林立、争斗迭起的混乱状态。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柔然、蠕蠕、突厥等政权先后称雄西域，与黄河流域的北魏、北周、北齐和长江流域的南朝诸政权多有往来。及至隋朝统一全国，西域诸国如伊吾、高昌、龟兹、疏勒、焉耆、昭武九姓胡等皆来朝贡。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诸姓酋长相继率部落内属，唐太宗对其厚加抚慰，以其地为岷、奉、岩、远四州，各以其首领为刺史。其余诸羌散居河西陇右，其中处泾、陇州界之羌，于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率众至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处请降。西北边地之羌于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内附，人口约20万，乃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令居于灵州、夏州境内。唐肃宗至德年间以后，诸羌常受吐蕃蛊惑，叛服不定。唐

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归顺州、乾封州、归义州、顺化州、和宁州、和义州、保善州、宁定州、罗云州、朝凤州等十部落至山南西道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处请州印，朝廷许之。此后不久，其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

伊吾，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密地区，汉魏时称为伊吾卢，隋时设伊吾郡。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其首领石万年携众来降，起初，唐太宗以其地置西伊州，后改为伊州，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设立的首个与中原正州性质相同的地方行政区。

高昌，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地区，西汉时为车师前王庭之地，东汉戊己校尉故地，魏晋时称高昌壁。汉朝以来长期派兵驻守高昌，其后裔遂家于此。北凉承平十八年（460年），柔然攻击高昌，盘踞高昌的北凉沮渠氏被消灭。柔然人立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自此建国。阚氏高昌国祚短暂，二世而亡。此后，张孟明、马儒先后称王，但均被国人弑杀。国人推举麴嘉为王，即麴氏高昌国。阚、张、马、麴四氏先后称王高昌，其中麴氏高昌享国最久，国力最强大。麴嘉为高昌王时，焉耆国因嚙哒入侵向高昌求救，麴嘉派其次子为焉耆王。自此，高昌势力逐渐壮大。高昌土地肥沃，农耕发达，风俗与中原颇为相似。隋炀帝时期，高昌王麴伯雅来朝，隋炀帝拜其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弁国公，并将戚属宇文氏之女华容公主嫁于麴伯雅为妻。麴伯雅归国后，不仅定期遣使朝贡，还经常上书汇报西域诸国动态，堪称隋王朝在西域的眼线。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麴伯雅之子麴文泰来朝，唐太宗厚加赏赐文泰夫妇，并赐其妻隋华容公主李姓，改封常乐公主。麴文泰曾随其父麴伯雅来到隋朝，此行前来发现唐朝陇西诸地萧瑟异常，远不如隋朝富庶，于是渐起不臣之心。高昌地处丝绸之路中道要冲，为东西往来必经之地，麴文泰回国后，不仅屡次依靠地理优势壅绝西域贡唐使节，掠夺其财物；而且与西突厥勾结攻击伊吾、焉耆；唐太宗遣使责问时，麴文泰又语出不敬，彻底激怒了唐太宗。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八月，唐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众出兵高昌。消息传到高昌，完全预料不到唐王朝会大军压境的麴文泰惊惧而亡，其子麴智盛坚守不成，被迫出城投降，存在了180年的高昌国宣告灭亡。曾经与麴文泰互为声息的西突厥叶护镇守可汗浮图城，听闻唐军压境高昌灭亡，也闻风而逃，侯君集大胜而还。唐太宗最初在高昌故地设置西昌州以羁縻之，后来又改变初衷，改西昌州为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又以可汗浮图城置庭州。从此，伊、西、庭三州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经营西域的桥头堡。

焉耆，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东接高昌，西邻龟兹，隋唐时一度役属于西突厥。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焉耆王龙突骑支遣使人朝贡方物，因高昌王麴文泰遮蔽东西过往通道，请求唐朝开通大碛路，获得唐太宗批准，从此与高昌结怨。此后，麴文泰频频派兵侵袭焉耆，每次都大肆剽掠而去。西突厥莫贺设与咄陆、弩失毕等部不和，出奔焉耆，咄陆部于是派兵攻击焉耆。焉耆为了在强敌林立的西域生存，只能亲唐以求自保。西突厥内乱后，唐太宗遣使封阿史那同娥设为啞利失可汗。啞利失可汗向来与焉耆亲善，于是唐太宗命令其与焉耆互为后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突厥处月、处密部落与高昌勾结，攻陷焉耆五城，劫掠焉耆男女1500余人，并放火焚烧了其住所庐舍。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出师高昌，事先派遣使者到焉耆，与焉耆结盟。焉耆王大喜，请求作为唐军后援。唐军大破高昌后，高昌王麴智盛举国投降，焉耆王亲自到军门表示祝贺。侯君集将突厥处月、处密部落与高昌劫掠的焉耆人口归还给焉耆王。焉耆王又派遣使者到长安城谢恩并贡献方物，双方关系非常密切。不久之后，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弟娶焉耆王之女，双方约为唇齿。自此以后，焉耆与唐关系逐渐疏远，朝贡亦越来越少。贞观十八年（644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奉命征讨焉耆，俘虏焉耆王龙突骑支及其妻子，当时唐太宗驾幸洛阳宫，故执送焉耆王及其妻子于行在。命其弟粟婆准摄政。郭孝恪班师回朝以后，西突厥势力趁机介入焉耆。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派遣阿史那社尔讨伐龟兹，西突厥所立焉耆王阿那支投奔龟兹，被唐军所杀，阿史那社尔另立焉耆王，从此，焉耆朝贡不绝。

龟兹，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西距京师7500里，国王姓白，国内有城郭屋宇，以耕田畜牧为业，其风俗略与汉同。西汉中期，龟兹王绛宾曾为汉朝侍子，居长安多年，仰慕汉风，汉化程度相对较深，又娶乌孙王翁归靡与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一心向汉。龟兹国人学胡语（笔者推测为突厥语）、婆罗门语，皆精于计算，信仰佛教。唐朝初立，龟兹国王即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又遣使贡献名马，唐太宗赐其玺书，此后朝贡不绝。但是龟兹距西突厥很近，畏惧西突厥，因此夹在唐与西突厥两国之间，执首两端。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遣阿史那社尔、郭孝恪等讨龟兹，俘龟兹王诃黎布失毕及其相那利等以归，立其弟叶护为龟兹王。安西都护府治所亦迁移到龟兹都城，以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与龟兹等“安西四镇”。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唐高宗嗣位，因安西都护府距离中原悬远，每

年派驻军士劳民伤财，因此下令放弃龟兹等四镇，复移安西都护府于西州。唐高宗咸亨年间，吐蕃势力进入西域，焉耆以西的“安西四镇”诸城堡，皆陷于吐蕃。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与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此后，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驻军三万以镇守。但是每年都要征发内地精兵良将远涉沙漠，环境艰苦，而且守军的衣物钱粮等也必须从民间征用，百姓负担极重，苦不堪言。朝中大臣纷纷上书请求放弃“安西四镇”，武则天始终不允许。

其余如疏勒、于阗、罽宾等国，先皆臣服突厥，后又依附唐朝。及至“安史之乱”后，唐室衰微，无暇西顾，西域诸国遂沦为吐蕃附庸。

河西走廊以西（今青海省大部），隋朝时曾是吐谷浑的天下。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吐谷浑王伏允屡犯隋朝边陲，隋炀帝派兵出击，于次年大破吐谷浑，隋王朝开疆拓土达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设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青海河源地区首次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大业末年，中原内乱，伏允乘机收复故地。唐朝初立，忙于镇压国内割据势力，无暇西顾，伏允不时剽掠唐境，边民颇受其苦。唐太宗即位后，伏允大玩两面派作风，一面向唐朝贡请婚，一面频频剽掠唐朝边境。唐太宗贞观九年（625年），唐太宗派遣李靖、侯君集、李大亮等联合突厥、契苾部众与吐谷浑决战于河源，大破吐谷浑，伏允兵败自杀，其子慕容顺率众来降，唐太宗封其为西平郡王，授赭胡吕乌甘豆可汗。但是，慕容顺从隋朝时就在长安为质子，汉化程度较深，为人软弱而倾慕华风，国人不服，不久即被国人所杀，其子慕容诺曷钵即位。慕容诺曷钵年幼即位，更难以服众，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唐太宗派兵为援，封其为河源郡王，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并赐鼓纛。诺曷钵入朝请婚，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将宗室女弘化公主嫁于诺曷钵为妻。第二年，吐谷浑丞相王作乱，欲袭击弘化公主，劫掠诺曷钵投奔吐蕃，诺曷钵惊恐之下，只好携弘化公主轻骑奔鄯州城。鄯州刺史杜凤举与吐谷浑威信王合兵击败丞相王，并遣使入朝报告。唐高宗即位后，拜诺曷钵为驸马都尉，多所赏赐。之后，吐谷浑与吐蕃之间多所征伐，双方均派遣使者请求唐王朝主持公道，唐高宗不置可否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吐蕃大相禄东赞。禄东赞出兵大破吐谷浑，诺曷钵无力抵御，只好与弘化公主投奔凉州。唐高宗派薛仁贵出兵援助，反为吐蕃打败。于是，吐谷浑之地尽为吐蕃所占。诺曷钵带领亲信数千帐投靠唐朝，唐高宗在灵州境内设置安乐州，拜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将其部众安

置于此。“安史之乱”后，吐蕃趁乱攻陷安乐州，吐谷浑部众向东迁徙至朔方、河东境内，史称“退浑”，中唐诗人吕温出使吐蕃，有《蕃中答退浑词》诗，说明至少中唐时退浑与吐蕃之间还有往来。

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投奔凉州后，其属地全部为吐蕃所占。从此，吐蕃与唐政府领土直接毗邻。“安史之乱”前，唐蕃之间战和不定，双方领土亦时有盈缩。及至“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来势汹汹，势难抵挡，自范阳向西南，河北、河东、河南三道诸州县相继陷落敌手，占领东都洛阳后，叛军一路向西，逼近长安，为了抵御叛军攻势，唐政府不得不尽调河西、陇右节度使之兵力回防平叛，即所谓“行营”。河西、陇右节度使之兵尽数内撤，遂使河西、陇右守备空虚，吐蕃趁机出兵，河陇大片土地陷落吐蕃。自唐肃宗乾元年间开始，“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淹没者数十州。”^①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相继兵败，叛军攻入长安，烧杀掳掠，为非作歹，昔日的首善之区转眼之间变成叛军巢穴。为尽快收复东、西二京，唐肃宗被迫以“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女子皆归回纥”^②为条件，借回纥兵入唐平叛。收复东、西二京后，回纥纵兵大肆抢掠，唐政府又赏赐回纥大量金帛财物，国库日渐空虚，国力早已不复昔日之盛。藩镇割据问题亦渐露端倪，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唐政府自顾尚且不及，更无暇关注西北领土的沦丧。面对吐蕃的不断侵扰，唐政府被迫一再与吐蕃建立盟约，约定双方分界线。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唐蕃双方在平凉结盟，结果发生了吐蕃劫盟事件，唐结盟使浑瑊勉强逃脱，结盟副使崔汉衡被俘，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唐政府在唐蕃力量对比上渐趋下风。所幸，吐蕃虽屡次犯边，但双方以陇山为界的情况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大中年间，吐蕃内乱，国力式微，唐蕃双方力量对比再次发生改变，吐蕃边将以秦、原、安乐等三州七关来降。此后，沙州刺史张议潮又率瓜、沙诸州内附，唐政府封其为归义王。至此，陇山以西陷落吐蕃的河湟诸州重入唐朝版图。

2. 漠北地区

唐朝立国之初，西北除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周边地区以外几乎全是游牧民族的栖息地，长安正北有突厥、薛延陀，西北有铁勒、昭武九姓胡、疏勒、龟兹等西域诸国，西有吐谷浑、吐蕃，古称“河西”的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带，也繁衍生息着不少游牧部族。吐谷浑、突厥、薛延陀、西域诸

^① 《旧唐书》卷196上列传第146上《吐蕃上》，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版，P3563。

^② 《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至德二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P2707。

国等实际或名义上归属中央政权经历了或短或长的历史进程。

突厥是南北朝后期活动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5世纪时，柔然强大，征服了突厥，将其迁居到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为柔然奴隶主锻铁，号称“锻奴”。随着柔然政权的逐渐衰落，不少草原部落包括突厥在内开始不断反抗柔然的压迫与统治。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并合并了铁勒各部五万余落，势力逐渐发展壮大。552年，土门打败柔然，建立起了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其势力迅速扩展到蒙古高原。佗钵可汗在位时，势力更大，控弦达数十万，北周、北齐皆慑于突厥汗国的强大实力，频繁向突厥进贡财物。佗钵可汗曾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①所谓“在南两儿”即指北周、北齐。

隋朝初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与隋朝之间的关系相对微妙，战和不定，故有隋一代对长城的修筑始终不遗余力，正是二者关系多有变化的必然产物。唐初，东突厥连年侵扰内地，掠夺人口与财富。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进攻朔州、太原。武德九年（626年）更大举入侵，20万兵力直逼唐长安城外的渭水便桥，距长安城仅40里，李世民被迫与颉利可汗结“渭水之盟”，才换来了喘息之机。经过数年的养精蓄锐，唐朝经济渐趋恢复，国力日渐强盛，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命李靖、柴绍、薛万彻等率兵分道出击，一举击破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灭亡，东突厥控制的漠南地区归唐。颉利可汗至长安后，被安置在太仆馆中，郁郁而不得志，常与家人相对悲歌而泣。为了安抚颉利可汗，唐太宗特意选择盛产麋鹿的虢州为其封地，以其为虢州刺史。颉利不愿就任，于是改授为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居长安。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颉利可汗卒于长安，赠归义王。

东突厥灭亡后，其部落或北走薛延陀，或西窜西域，余部大多归降唐朝。关于如何安置东突厥降众，唐朝君臣多有分歧。多数朝臣以为突厥强则侵扰，穷则归降，故其归降必非本意，应分散其种落，置之于河南兖、豫之地，散居州县之间，使其从事耕织，既可以增加国家户口之利，也可以免遭胡虏侵扰之患，一举数得。惟中书令温彦博以汉光武帝置匈奴于五原塞之故事，请求保全突厥部落，遭到秘书监魏徵的强烈反对。最终，唐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在朔方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东突厥故地设置六州，以定襄都督府与云中都督府统辖，领其部众。突厥酋首至唐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一时之间突厥人入居

^① 《隋书》卷84列传第49《北狄·突厥》，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版，P1250。

长安者多达数千家。突利可汗官拜右卫大将军，封北平郡王。唐太宗以其兵众置于顺、祐等州，并令其率部落返回东突厥故地。临行前，唐太宗特意以其祖父启民可汗、其父始毕可汗之事告诫他，“当须依我国法，整齐所部，不得妄相侵掠，如有所违，当获重罪。”^①这是唐政府在边疆设置羁縻府州的开始。次年，又下诏征召突利可汗入朝，行至并州（今山西太原附近），突利可汗病卒，其子贺逻鹘嗣位为都督。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结社率随驾九成宫，拥立贺逻鹘起兵反叛被杀，贺逻鹘被流放岭南。此次突厥贵族叛乱让唐太宗逐渐意识到突厥处中原之患，也再次引发了朝臣的争论。唐太宗将东突厥部众安置于黄河以北地区，立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侯利苾可汗，赐姓李氏，命其率领所部建牙帐于黄河以北，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最初，唐太宗欲将其安置到白道山之北，但李思摩畏惧薛延陀部落侵袭，不愿北迁。为了打消其顾虑，唐太宗派遣使者颁赐玺书给薛延陀，严令薛延陀居碛北，突厥居碛南，双方各居其地，各守其境，镇抚部落，不得相互逾越抄掠，否则必将兴师问罪，从行政角度规定了唐代时期大漠南北的民族分布格局。同时，又以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以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以监视东突厥部众。李思摩虽骁勇善战，却统驭无方，不懂得安抚部众，部下不服。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部众叛乱，纷纷渡河而南，唐政府将其安置在胜、夏二州（即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李思摩轻骑入朝，官授右武卫将军，从征辽东，战歿，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薛延陀以同罗、仆骨、回纥、靺鞨之众度漠，屯于白道川，唐太宗命张俭、李勣、李大亮、李袭誉等破之，薛延陀远遁漠北。贞观二十年（646年）六月，命崔敦礼、李勣破薛延陀于郁督军山北。铁勒、回纥、拔野古等十一姓分别遣使朝贡归降，请置汉官。同年九月，铁勒诸部落俟斤、颉利发等遣使至灵州，于是漠北之地尽归于唐。唐王朝于突厥之北至回纥部落沿途，设置馆驿六十六所，以通北荒。

当时又有突厥别部车鼻，世代为小可汗，其牙帐在金山之北。颉利可汗战败后，北荒诸部推举车鼻为大可汗，然而车鼻畏惧薛延陀，率部归之。后因与薛延陀不相容而窜归故地，自称乙注车鼻可汗，其西之歌罗禄、北之结骨等部皆来归附。薛延陀败亡后，车鼻可汗遣其子沙钵罗特勒来朝贡方物，唐太宗下诏征其入朝而不至。其长子羯漫陀统领拔悉密部，

^① 《旧唐书》卷194上列传第14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版，P3510。